

冰花

张呈明

今年的第一波寒潮来得又急又猛，一不小心就踏进了寒冬。慵懒地躺在温暖的被窝里，听着窗外呼啸的寒风，思绪一下子飘得很远很远，一直飘回到小时候的数九隆冬。

那个时候的冬夜，特别的漫长，也非常难熬。除了人，似乎所有的生命都冬眠了。然而，就是这样的寒冬里，却有一种花儿在酝酿着春潮，那就是盛开在窗玻璃上的冰花。

才下午四点多，夜幕就裹挟着刺骨的寒冷悄然降落，整个世界除了吹着哨的西北风，一切都静悄悄的。屋外的寒气往窗玻璃上扑，屋里的热气也顺势往上滚，就在这冷与热的交锋中，那一朵朵冰花便开始了它们如梦似幻的生命旅程。

白天夜里是看不到什么的。睡前趴在窗台上，玻璃还是透亮的，能看到靛青的天幕上那轮月亮，散发着冷清的清辉。

因为记挂着看冰花，于是早上睁开眼睛没有再恋被窝子。一骨碌爬起来，先往窗户那儿瞅。呀，玻璃全白了！不是雪那样厚墩墩的白，是那种透亮、晶莹发光的白。先是窗角那儿，冒出几根细细的线，跟老树枝似的，歪歪扭扭伸向中间。伸着伸着，就分出杈来，杈上又生小杈，密密麻麻的，像极了北山上的松树林，枝枝丫丫都看得清。有时候，又不是树枝。是一团团的，像娘缝衣裳的棉线团，又像过年时挂的棉花灯，蓬蓬松松的，看着就软和。

左边还有一片“松林”，针脚细得跟真的松针似的；右边是一片“羽毛”，一层叠一层，跟家里老母鸡尾巴上的毛一样软。

正是做梦的年龄，我的世界充满了奇思妙想。看着看着，不知不觉便进入到这玉洁冰清的童话王国之中，让自己和这些奇花异草融为一体。在这奇异的冰天雪地中，也许能遇到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，邂逅那条美丽

的美人鱼，还有那个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……

“哎哟，小祖宗！快把棉袄穿上，冻着了我不揍你！”娘在灶台上忙乎着早饭，手里攥着刷帚朝我吼着。我嘴上应着，眼睛还黏在玻璃上，心里琢磨：这冰花是怎么长出来的？莫非夜里神笔马良来过，在窗上画画了吗？

有一次，下了一夜的大雪，我也做了无数个梦。清晨，恰逢周末，窗上的冰花开得特别灿烂。好睡懒觉的我早就爬起来，跟几个前来找我玩的小伙伴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哪朵冰花更漂亮。小冬说快看快看，这里有一只白色的狐狸。“你什么眼神儿？那不明明是条小狗狗么！”丁香的小脸涨得通红，据理力争着。“你俩说得都不对，这不就是俺家的小花猫吗？哦，什么时候变成白色的了？”我也加入了他俩的辩论团，都说自己说得对，一时间谁也不让谁。不一会儿，祥子那边又有新的发现，于是，大家重归于好，又蹦又跳，那

纯真无邪的笑声震落了树上厚厚的积雪，惊飞了同样叽叽喳喳的小麻雀。

忽然，身上多了一件温暖的棉袄。哦，是母亲刚刚架在炉子上烤热后披到我身上的。顿时，一股热流传遍全身。

外面的阳光越来越强，气温随着我们的嬉闹逐渐升高。窗玻璃上的花呀，树呀，松针呀渐渐变得模糊了。先是少了几根松针和一片花瓣，紧接着整朵花消失了，最后所有的花草树木都化作一颗颗晶莹的泪珠滑落下来。我想，那肯定是不愿离去的泪水。虽然知道明天早上还会有更加美丽的花儿开放，但是仍然有万般的不舍和失落。

不经意间，当初年幼的我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中年人了。八年前，我搬离了故乡，住进了有暖气的楼房，冬天屋里暖烘烘的。每到天冷，我总会趴在宽大的玻璃窗上找呀找，盼望着能像小时候那样，忽然看见冰花悄悄开在上面，哪怕只有一朵，两朵。

然而，如今的窗子都是双层玻璃的，冰花的出现几乎为零。但是，每当它们在梦里一次又一次地盛开的时候，那份感动和惊喜，依然和少年时那样强烈。

窗上的冰花，只能开在简陋的老屋里。也许，它注定只属于那个已经遥远的故乡和年代。想起冰花，依然感觉到母亲披在我身上那件棉袄的温暖，瞬间打湿了久违的感动和思念。

皖南初行记

王玉珏

第一次去皖南，是在四十四年前。那年我二十四岁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独自远行，且怀揣着爸爸的夙愿，前去了却……

一九八一年四月二日，受单位指派，到滁州参加“全省农业银行监督拨款培训”学习。临行前爸爸让我去皖南休宁看望久别的二姑。

听爸爸说，他同二姑还是解放前一九四八年冬在杭州一别，至今未曾谋面，靠书信往来几十年。这次让我培训结束后绕道去休宁探望。

滁州到休宁怎么走？坐什么车？我事先一一做了“功课”。十天的学习结束了，四月十二日下午，我坐上了滁州赶往芜湖的客车，到芜湖已六点多，汽车站下班了，从门卫那得知，去休宁唯一的班次是凌晨五点四十分。

考虑明天还要乘车，我就找了一家车站旁的旅馆住下，价格八角，还办了手续，在门口吃了一块烧饼，按照旅馆服务员大妈的指引，我爬上了最高层七楼。房间是大通铺，我的床号是16，靠在窗边，窗户缺少了两块玻璃，用硬纸板堵着，窗外高耸入云的大烟囱在隐约的昏暗中冒着黑烟，床上落满了烟尘，我抖了抖床单上床睡了……

四月，春初的季节，寒意仍然没有完全褪去，尤其是夜晚，更觉寒意浓浓，加之窗户关闭不严，冷风阵阵袭来，我蜷缩着身子强迫自己快快地入睡，因为明天还要早起……

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，被冷风惊醒，我索性起来退房，在服务台看了一下时间是凌晨三点半。

凌晨的芜湖车站冷冷清清，街道远远孤寂无人。我在车站旁吃了一碗糊辣汤和两根油条，终于买了票上了开往皖南的火车。

由于昨晚没睡好，上车我就恍恍惚惚地睡着了。当醒来的时候，车子正在两山之间崎岖的山坳中行驶着……

客车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奔跑，车窗不严，吱吱呀呀的窗框扭扭曲曲，加之阵阵凉风钻进车内，我不禁有些打哆嗦……但是，窗外的景色瞬间驱走了我身上的寒意，山顶上薄雾茫茫，环绕山峦；山腰中杜鹃花开得姹紫嫣红、艳丽诱人；山脚下溪流潺潺，波光粼粼……

在淮河岸边长大的我，从来没见过如此高的山，如此多的山，如此美的山……况且，一路两旁山连着山，山依着山，绵延起伏不断，令我目不转睛贪婪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。

一路颠簸走了近两个小时，下午三点终于到了休宁，按照二姑信上写的地址，叫了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到了二姑住的街道。

“玉珏，玉珏！”我刚下车，还没回过神来，突然听见有人叫我。我顺着声音望去，一位精神饱满、神采奕奕的中老年妇女一边叫我，一边向我招手。我毫不犹豫地肯定，她就是二姑！

“二姑，您怎么知道我呀？”“她等您很久了，东张西望的，你不是我大侄子还是谁呀？”二姑牵着我的手，把我引进了家，二姑夫站在门口，笑脸相迎地开口道：“大侄子跟杰辉长得一样！跟杰辉（爸爸的）名字）长得一样！你看看这耳朵，你们王家都是耳朵垂大呵。”

“同你爸在杭州分别时，他还没你大，才二十来岁，转眼儿子都这么大了。”二姑滔滔不绝地陈述着过去的曾经，询问着现在我们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，我几乎插不上话，只能一问一答。

快到夜里十二点了，二姑夫打断二姑的话：“时间不早了，大侄子坐了一天的车，让他睡吧。”

第二天，我一睡醒到自然醒，吃罢早饭，二姑夫带我到休宁县城转转，逛了逛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当时的休宁县城不大，却比我们淮河边的小县城显得清雅别致。县城的上午是恬静的，四周雾蒙蒙胧，街道旁的河水清澈见底，远方的山、近处的房屋建筑倒映在河水中。我们时而走过石桥，时而拐过一个小巷，时而穿过古色古香的古建筑……皖南的休宁县城让我流连忘返。

在二姑家住了两个晚上，既完成了爸爸交给我看望二姑的任务，也到了该回去上班的时候。

在同二老分手告别的时候，二姑给我带了一大包皖南特产，拉着我的手迟迟不舍松开，我清晰地看到二姑两眼噙着泪花，嘴里叮囑着，一股股浓浓的暖意涌上我的心头……

六安市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

本报讯(记者 杨庆云)12月21日上午，六安市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，全市90余名会员代表参会，共商六安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大计。

大会听取并审议市作协第三届主席团工作报告，审议通过《六安市作家协会章程》等文件，全面回顾近年来协会在人才梯队建设、精品创作培育、基层文学活动开展等方面成效，明确今后五年六安文学事业发展方向与任务。大会选举产生市作协第四届理事会和主席团，陈斌当选第四届主席团主席。

新一届市作协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，锚定皖西红色基因与乡土文脉，团结凝聚全市文学力量，深耕主题创作，厚植人才沃土，创新传播路径，推出彰显时代精神、饱含六安印记的精品力作，培育老中青衔接有序的文学梯队，借力新媒体矩阵推动六安文学作品走出书斋、走向大众，持续打响“红色文学”“乡土文学”品牌，为六安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。

省作家协会、市文联、市民政局、市纪委监委驻市委宣传部门纪检监察组等部门负责人到会指导，各县区文联主席、市作协代表参加会议。

砸金蛋

汪振路

2010年5月1日上午，山城小县某房地产项目开盘了。

售楼部门口，高大彩虹门伫立在广场正中央，彩旗飘飘，长长的红地毯穿过彩虹门一直铺设至售楼部，大喇叭高分贝地播放着歌曲《好日子》，四方顾客喜笑颜开，蜂拥而至。售楼部内，人头攒动，欢声笑语，围绕着楼盘模型，里三圈外三圈，好不热闹。

商家为了促销，安排了砸金蛋互动环节。上午10:18，有购房意向的帅哥靓妹站成一排排，5人一排，轮番挥舞着锤子，兴奋地砸向金蛋，“啪、啪、啪”，金蛋炸开，金花四溅，惊叫和欢呼声冲翻了售楼部。

“中啦”“中啦”，张浩妻子陈陈激动地大声喊了出来，手气不错，砸出了5000元折扣券和一个大礼包。张浩一家三口无比高兴，满意而归。

这是张浩夫妇第一次购房，张浩现在是一家建筑公司小有名气的项目经理，结婚时没有房，和父母亲暂住一起。经过几年打拼，现在有了积蓄。为了女儿能够上个理想小学，便在重点小学附近楼盘买了首套房，第一次参与砸金蛋。

张浩帅气聪明，因为高中早恋，没考上大学。经父亲周旋，张浩进入了父亲战友经营的某民营建筑公司，父亲为此还专门请战友喝了一顿老酒，战友对张浩也上心，专门给张浩请了个师傅，张浩跟着师傅用心学，不懂就问，加上高中文化，很快就上路了。还自修大专文凭，考取了建造师资格证。好学历，深得师傅赏识；仪表堂堂，也赢得同样没有考上大学的师傅女儿陈陈喜欢。陈陈漂亮能干，平时帮助母亲在商业街做着小生意。陈陈母亲农村户口，很早就做小生意，家庭生活殷实。

这两年年轻人对上眼了，很快恋爱了。双方父母乐见其成，结婚生女，工作顺利，家庭幸福。

随着房地产业兴起，全民开始炒房。张浩夫妇曾尝到小甜头，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，两口子合计，在靠近重点初中附近新开盘的小区，又买了一套房。妻子又砸了一次金蛋，全家依旧兴奋无比。

房地产业发展，张浩的施工活也干不完，也跟着发了。张浩一家房子也是越来越多，从首套到二套，现在又买了一套房，妻子第三次砸金蛋，一铺养三代，又买了一处商铺，第4次砸金蛋。

眼看房价价格蹭蹭上涨，一年一个平方上涨千元左右，一套房一年能赚10万元，投资房地产，保值又增值，张浩开始有点坐不住了。

2014年，有人拉张浩入股投资房地产项目开发，项目小，短平快，两年结束，又赚了一把。

2017年，有个药材老板找到张浩，合伙搞房地产开发，人家投资70%，当董事长；张浩投资30%，当总经理，全权负责项目开发建设。

张浩心动，想行动。回家把这个想法跟爱人商量，说房地产开发回报高。爱人说：“我们现在挺好的，最好别折腾。”父母亲听说儿子要搞房地产开发，赶紧跑来劝阻。母亲说：“浩儿，知足常乐啊。”父亲说：“高回报潜在高风险。”喜欢看新闻联播的爷爷插话道：“中央都说了，房住不炒。”张浩哪里听进去，心就行动，说干就干。成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，投标拿地，招兵买马，信心十足，准备大干一场。

二胎政策放开，张浩妻子给他生了胖儿子，张浩是家庭事业双丰收。

张浩的房地产项目分三期开发，共计900套。一期300套，开盘售罄，初战告捷，增强了张浩对房地产开发的信心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二期建设遭遇新冠疫情，建设工期受阻，也影响了销售。2022年疫情结束，加快建设，二期竣工，期待销售反弹。在房地产政策刺激下，二期300套房屋截止2024年春节正月十五，只卖了不足三分之一。三期加足马力，全力推进施工，定于2024年5月1日开盘。

2024年春节，山城小城，春寒料峭，过了正月十五，人们还窝在家里过年，不愿出门，街上行人寥寥。本指望春节促销一下，正月结束一盘点，200多套房子仅售出20套，张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
2024年4月1日上午，张浩像往常一样来到设在售楼部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。刚坐下，秘书就把月度项目销售报表等有关资料递上。张浩认真翻阅起来，令他没想到，上月销售业绩为零，竟然一套也没有卖掉。他“腾”地一下子站了起来，额头和手心都冒出汗来，火冒冒地问站在一旁的秘书：“今天是愚人节，是不是故意愚弄我啊。”秘书急忙解释“张总，哪敢啊，这是真实的。”“知道了，忙你的去”，张浩摆手让她出去。

2024年5月1日上午，三期如期开盘。售楼部门口，高大彩虹门依旧伫立在广场正中央，彩旗飘飘，长长的红地毯，喇叭依旧高分贝地播放着歌曲《好日子》，年轻帅气小伙，漂亮标致姑娘，个个面带微笑，笔直地站立在红地毯两旁，时刻迎接四方来客。售楼部内，灯火辉煌，桌椅沙发，一尘不染，茶水果盘，一应俱全，工作人员各就各位。位于售楼部东北角的砸金蛋场地、设施等全部布置到位。万事俱备，就等尊贵的购房者光临。

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，张浩西装革履精神抖擞，一大早就赶到售楼部，他要亲自坐镇指挥。已是上午9点半了，可几百平米售楼大厅，仍是空荡荡的，门可罗雀，只有工作人员在晃动着，却不见看房客。张浩顺着房地产项目楼盘模型转了一圈，用余光扫了楼盘模型，皱了皱眉头，心里就纳闷了，房市怎么说不行就不行啦？他没停下脚步，走近放置金蛋的长条桌边，一屁股坐在旁边的沙发上，点燃一支烟，狠狠地吸了一口，又吐了出去。看着金灿灿的金蛋，红彤彤的桌布，就是没见砸蛋的人，当年买房时爱人一次次砸金蛋的兴奋开心热闹场景，一幕幕浮现在张浩眼前。

张浩一拳狠狠地砸在沙发上，哎，这次真是砸蛋了。

有这样的时刻，一个词入耳，像一根火柴点燃蛰伏的引线——它曾黯淡失色地匍匐于墙角，历经阴晴雨雪，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。若遇响晴日子，记忆便顿时喷薄成花海，这个词，是“蒲包”。

我姥爷的大家庭曾有大片房产，分嫡庶两支，又有叔伯几房。抗战的隆隆炮声里，他去上海投奔哥哥。彼时哥哥已置办房产、有了新人，后来又接了家乡的旧人，各安天命，那是旧时代特有的秩序。姥爷起初在上海做学徒，这段历史我知之甚少；我记得的，是他一再讲述的片段——像青石板上深深的车辙印，每一次讲述，都让那些过往真实地“存在”。日军曾占领家乡小城，不过几日便旋即光复。姥爷回乡后，决心挣脱大家庭的桎梏，自立门户，在城西买了一处带院子的宅子：三间正房加一间厨房，他把其中一间租了出去。

时代风云变幻，大家庭的房产终究被没收，叔伯兄弟也四散分离。除了自己购置的这处宅子，姥爷没有其他产业，家里有缠小脚的妻子，还有四个挨肩长大的子女要吃饭、上学，还好，在唯成分论的当时，姥爷被划成“小土地出租”——有出租行为却无雇工剥削，这“不红不黑”的中间地带，把他算成了工农的伙伴。

姥爷不算聪明，小时候常挨私塾先生的尺子打手心，性子老实敦厚，还带着点胆小，街坊都笑他“树叶掉下来也怕砸脑袋”，像极了契诃夫笔下“套中人”“别里科夫”，他身形高大，脸色却有些青白。我妈妈说他，小时候挨打时，也只是笑笑，从没说过。姥爷姓卫，排行第三，名季诚。我小时听到姥爷的名字，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群被精心饲养的毛茸茸小雏鸡（“季诚”与“鸡成”谐音，孩童的联想里满是软乎乎的暖意）。姥爷吃了不少读书的苦，常被他人夸有“书生气”，却没尝到读书的甜头，终究还是要脱下长衫，挑起养家的担子。他曾贩过大米，最后赔得底朝天；也贩过鸡蛋，有次赶上“跑反”（战乱时百姓逃难的恐慌——每一句飞散的流言都在加重恐慌，人心无底的猜测最伤人。姥爷挑着鸡蛋筐拼命跑，顾前不顾后，扁担晃得厉害，箩筐像荡秋千似的，最后落了个“鸡飞蛋打”。大人们说起这事时，脸上总带着个唏嘘，念叨着“拿龙捉虎，做啥啥不行”。拿龙捉虎是本地俗语，意思是干小事笨拙不成，偏摆出要干大事的架势——“拿”字里藏着种轻佻重放的虚浮豪迈，就像说“拿下家伙”时的故作声势。可“拿龙”的姥爷，当时不过是个四顾茫然、不知归处的中年男人，那迟钝里藏着的，全是说不出的悲哀。我从小听他的故事，总想起课本里“一个鸡蛋的家”的典故：姥爷和故事里的人一样，盼着“蛋生鸡、鸡生蛋”，在这样循环的循环里挣个小康日子。鸡蛋碎了，希望也碎了，换作旁人早该大哭一场——姥爷或许没哭，他性子慢，连难过都比别人迟半拍；可他或许也哭了，虽说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可男人为何不能哭？古人“歧路亡羊”尚且落泪，何况他养了一家人的生计指望。只是人们总忘记故事里“鸡飞蛋打”的热闹开头，却少有人问起他后来如何收拾残局的消瘦尾声。

诸事不顺，可日子总得继续。后来，姥爷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豆腐店，无论冬夏，每天清晨四五点，他都到三里街的家步行到横街的豆腐店，装上满满一板车豆腐、干子、千张，再步行到车站去卖。这段记忆我是亲历的——我三四岁时就有了清晰的画面。那时，妈妈大学毕业后分到山区银行，我在山区出生；四五岁时，妈妈把我带回城里。记得刚回来时，我们走过熙熙攘攘的云路街，路边摊位鳞次栉比，路人挤在狭窄的过道里，五光十色的货品让我眼睛都看不过来。妈妈给我买了个粉色椭圆形塑料挎包，小小的，上面画着“小猫钓鱼”：小猫也撑着个小包，一手举着鱼竿，一手提着鱼桶，可爱极了。到了姥爷家，妈妈说要去买电影票，晚上带我去看电影。我被巨大的快乐冲昏了头，可直到天黑，妈妈也没回来。天黑了，院子里的小鸡都进笼了，我却找不到妈妈——那种“被丢弃”和“被欺骗”的双重打击，让我大哭不止。以当时像草履虫般单细胞的思维，我根本想不到，我们白天明明路过了电影院，妈妈怎么会一直不回来？

小孩子的伤心总容易被转移。就在我哭得起劲时，姥爷推开门回来了——卖完豆腐的他，刚好和哭鼻子的我撞个正着。如今再想起那一刻，漫漫的悲怆仿佛突然聚拢，酒成一汪湖，“咕咚”一声，往事沉

姥爷的蒲包

张薇

向湖底，湖面却荡开圈圈扩散的涟漪。那是个夏天，姥爷高高瘦瘦的，稀疏的头发向后梳着，露出光亮的额头；他穿一件白老头衫、一条灰色西装短裤，脚上的黑胶鞋及小腿肚，后背湿了一大片——不知是汗还是路上淋的雨。他收了黄油伞进门，手里还拿着一只蒲包。蒲包这东西，我从小既熟悉又陌生：熟悉是因为姥爷总带着它，陌生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。后来我特地在网上查过：传统蒲包以蒲草为原料编织，多是菱袋，你看里面的豆腐脑、毛票和硬币；有时能掏出一个大白桃，桃毛粘在手上，痒得我到处抓；有时是黄澄澄的小沙果，或是带一点红的枣子——我把这些东西倒在泛着红彤彤形包浆的凉床上，它们像一阵狂暴的小雨，“噼里叭叭”地弹到地上，我追着这个捡，转眼又丢了那个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等我再大些，过年时姥爷会从蒲包里掏出压岁钱：十枚崭新的纸币，连号的，还用红纸条箍着；他还带我去书店，买《动画爷爷的故事》给我。夏日的午后，我常拉开姥爷家那只黑漆黄铜环的抽屉——里面有梅花起子、羊角锤、烧了半截的蜡烛，还有本翻得磨毛了边的《三言二拍》。我捧着书坐在凉床边读，消磨了许多漫长的下午；读着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，想着三秋桂子、钱塘江潮，不知不觉黄昏就来了，灯光拉长了我的影子，可我的心还留在书里那些遥远又热闹的故事里。

白茫茫的冬早晨，二姨下夜班回来，常会从厂食堂买热腾腾的肉包子，装在铝饭盒里，轻轻摇摇梦中的我——那是我学龄前最暖的好梦。我坐起来，拢紧被子上棉袄，把二姨用热毛巾擦了擦手，接过包子咬一口，满是肉香。二姨还教我择菜，说芹菜顶端营养丰富，剪根时浅剪一点就行。可我小性子倔，偏要跟她反着来，故意把芹菜连根带茎剪去长长的一段。二姨生气地说：“让你向东别向西！”说着轻轻一巴掌打在我胳膊上，我丢下剪刀笑着跑开，留下她在原地无奈地摇头。有时我会推开院子的后门，去找照顾我的保姆——那个年轻的女子。她家离姥爷家不远，要穿过一个天井院子：四周是黑黢黢的门，晴天时太阳照进四方院子，地上的碎卵石间杂着青草，铺成几个相交的圆圈。盯着姥爷看久了，脚会觉得疼，眼睛也会花，掉进竹花筒里似的昏乎乎。可明亮的阳光洒在身上时，又觉得每个人都是这小院子里的主角。保姆和大的舅妈住在一起，每次我去，她都会给我倒水、拿零食；她常看《中国青年》杂志，有次说封三上有《军港之夜》的歌谱，我随手一翻就找到了。她大声夸我：“真聪明！你怎么知道封三是哪一页？”一旁耳背的大舅听了，也跟着笑起来。

姥爷离世已经四十九年，姥爷走了四十年，妈妈也离开我二十三年了。时间久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口算，非要拿计算器算一遍才能确认这些数字。看到这些年份，我甚至会忍不住想找些年代间的模糊规律：母亲先于子女离世，母亲与女儿的寿命，母亲与女儿的性格特征——哪些是传承，哪些是逆向的改变？谁又能命运这双翻云覆雨的手呢？我写过好几篇童年回忆，有的关于亲人，有的关于时间，有的关于城市的变化，每篇都有自己的侧重点，各自独立。若把城市片段连起来，或许能拼成小城两代爱好文字的女子（我和妈妈）的成长史。可我没打算把这些零散的记录，筑成一排榫卯咬合、情节交错的长篇回忆录——写回忆录的人，自身总得够“重量级”，谁会愿意看一个无名者的陈年旧事呢？三代之前的祖先，三代之后的后人，两处茫茫都不见踪迹。姥爷的故事，曾在亲友间口口相传，可随着时间流逝，那些往事像糖块融化在温水里，渐渐淡了。如今我这个外孙女，能抓取其中一二，写下这些像“雪地飞鸟”般易逝的片段，便已足够。